

南宋文化危机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诗学抵抗

段佳彤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南宋偏安之际面临严峻的文化认同危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借复古主张与诗学革新构建起蕴含政治隐喻的文化抵抗策略。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分析,聚焦“羽翼盛唐”这一核心,深入剖析“别材别趣”“妙悟”等诗学命题,揭示其对理学话语的消解、对文化正统的重构,以及强化汉族文化主体性的深层意图。严羽诗学不仅是美学层面的创新,更是一场借助文学展开的文化政治实践,为后世在文化危机中维护主体性提供了关键借鉴。在全球化浪潮下,其“盛唐气象”所蕴含的符号意义启发我们通过审美自律来坚守文化独特性。

关键词: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南宋文化认同危机;盛唐气象;妙悟;别材别趣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48

一、引言

《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诗辨》作为阐述严羽诗歌理论观点的核心部分,是《诗话》的总纲。其基本宗旨是指出诗歌艺术独有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触及到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一些基本属性,总体而言是强调诗歌艺术和审美鉴赏的特殊内在属性¹。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沧浪诗话》整本著作,较少针对《诗辨》一章进行深入研究;对《诗辨》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妙悟”与“别材别趣”,对盛唐气象及其政治寓意的研究较少,对“诗学抵抗”尤其是与理学的对抗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从盛唐气象、以禅喻诗及妙悟、别材别趣入手,探讨南宋文化认同危机下严羽如何通过构造“诗统”应对,揭示其思想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南宋文化危机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中原沦陷,“中国”地理概念破碎;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形成南北对峙格局,传统“大一统”观念被颠覆。在固有观念里占据中原的政权会获得文化正统,而南宋偏安一隅,文人士大夫面临文化正统的丧失。

在文学道统上,朱熹《伊洛渊源录》构建了一套以周敦颐为开山鼻祖、以程颢、程颐为核心的理学谱系,将文学纳入“载道”工具,文化的道统面临理学垄断;禅宗“不立文字”与全真教“三教合一”对儒家文化正统形成冲击。

而宋代文学创作也出现“异化”,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四灵派”和江湖诗人“稍稍复就清苦之风”即“自谓之唐宗”,抛弃了诗歌应有的品质。

三、“盛唐气象”政治隐喻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通过重构诗学谱系与美学范畴,在南宋文化认同危机中形成了一套隐性的政治抵抗话语。其核心策略是以“盛唐”为典范,通过对“气象”的政治编码和文学记忆的再造,以文学记忆重构“文化中

作者简介:段佳彤(2004—),女,本科,云南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段佳彤

1 王骏飞:《回归“诗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现代阐释》,《当代文坛》2005年第4期。

国”。

盛唐的“浑沌”气象恰是文化完整性与政治向心力的象征。严羽从文学理论角度再造地理空间,反复标举的“汉魏盛唐”在地理上实指被金人占据的中原故土。通过诗学话语,他完成了一种“文化收复”:正所谓“国破山河在”,盛唐诗人笔下的“河岳”成为文学版图上的“失地”,而严羽的诗学体系则成为抵抗地理断裂的符号武器。其“心理安慰”与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契合²。安德森认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依赖于成员对“共享文化符号”的认同,即便这种认同超越了地理或政治边界。严羽通过诗学经典化,让南宋士人在阅读盛唐诗歌时,跨越现实疆界,共享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严羽的努力类似于时间上的“逆殖民叙事”。严羽将盛唐确立为不可逾越的典范,“学其上,仅得其中”,实则是以文化时间对抗政治时间。理学提倡格物致知,强调当下道德学习与实践;而严羽以盛唐为法,将盛唐塑造成永恒的黄金时代,以此在心理上掩盖南宋在军事上的弱势。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通过总结历史规律强调“汉唐”的不可复制性,以“夷夏之辨”平衡清军入关建立政权的现实挫败感。严羽的诗学话语正是这一“逆殖民叙事”的先声。

四、以禅喻诗与“妙悟”

(一) 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类比思维,将“禅”与“诗”结合起来以诗的形式诉诸出来。“禅”包括禅理、禅法、禅趣等广泛内容,“诗”则涵盖诗派、诗人、诗作以及相关创作、赏析、评价等方面。以禅喻诗用了佛教禅宗中“参”和“熟参”的概念。严羽的“参”,是指对诗歌的阅读和体验;而“熟参”则是指精细熟练地研读和探究,表示参的频率和程度。参是一种直寻,主体鉴赏时由参而悟³。“妙悟”作为以禅喻诗的理论核心,将在后文展开论述。

严羽“以禅喻诗”的局限在于没有深入研究禅学,类比本身就不严谨。《诗辨》原文写道:“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严羽将汉魏盛唐列为第一义,这毋庸置疑。又以大历为小乘禅,晚唐为声闻辟支果,而乘只有大、小之别,声闻辟支也即在小乘之中。也就意味着严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大历以还之诗”和“晚唐之诗”归到了同一层级;又不知禅家只有南北之分,而临济元禅师、曹山寂禅师、洞山价禅师三人并出南宋,原无高下胜劣可言,且临济、曹洞俱是最上一乘,严羽的类比直接把曹洞拉低为小乘,很难不会引发误读⁴。

(二) “妙悟”

严羽在《诗辨》中提出的“妙悟”是其诗学理论的核心,矛头直指理学及其影响下的江西诗派等。悟是一种“不涉理路”的感性直觉,妙悟则是悟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主体对感性生动对象的直觉体验,反映了主体先天诗性素质的觉醒,超越了知识和经验,包含着透彻的洞见和创造性的诗思⁵。妙悟与禅宗顿悟有深刻关联。严羽借禅喻诗,以“透彻之悟”形容诗歌的最高境界,实则是以禅宗的“直指本心”对抗理学的“外求于理”。

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个体情感置于“理”的约束下。理学的核心方法论是“格物致知”,主张通过理性分析、逻辑推演来把握事物的“理”,投射到诗学中表现为以道德教化、义理阐发为诗歌的最高目标。朱熹从理学角度解读诗经,“郑、卫之乐,皆为淫声。……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⁶”,认为相比于卫,郑的淫奔之诗占比更大,内容更加奔放且“无耻”。由此提出的著名的“郑声淫”观点长期占据主流,对后世正常解读《诗经》中的情诗产生了不良影响。

除了直接批判爱情诗,朱熹还试图曲解其主旨以服务于理学的教化。在解读《诗经·关雎》时,他毫无根据地认为“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姬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又赞颂“其相与和乐而恭敬”,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审美情感强行纳入“文王之德”的政治伦理框架,又冠

2 班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六页

3 朱志荣:《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歌主体论》,《人文杂志》2014年第12期。

4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440页

5 朱志荣:《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歌主体论》,《人文杂志》2014年第12期。

6 (宋)朱熹注:《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2页

之以“和乐而恭敬”的道德伦理，称此诗“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⁷，把一首简单直率的情诗解读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诗歌沦为道德和学问的附庸。

严羽则强调“诗道亦在妙悟”，将诗歌创作与鉴赏归结为一种直觉式的、非逻辑的审美体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他以孟浩然与韩愈对比，高扬诗人的主体直觉：“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即“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这里“学力”代表知识积累，“妙悟”代表直觉审美；韩愈“以文为诗”体现理学家的格物路径，孟诗“一味妙悟”则是直觉把握。严羽借此表明，诗歌的价值不在于符合理学标准，而在于诗人个体的灵性体验。他主张诗歌的本质在于“吟咏性情”，明确反对以“理”和“学问”作为诗歌的核心，抵制道德说教和理性思辨。“不涉理路”的思维方式直接否定了朱熹“格物穷理”的诗学路径。

严羽的“妙悟”重新赋予了诗人以自由审美的权利，试图打破理学僵化的思维范式，将诗歌拉回“兴趣”“意境”等审美本体。他提出“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将诗人的直觉感悟视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动力。然而严羽的“妙悟”仅仅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根本制约作用，“妙悟”指导下的诗歌常常因缺乏思想内涵而成为一纸空文。

五、“别材别趣”说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在《诗辨》中提出的“别材别趣”对理学主导的文化秩序进行了深刻解构，瓦解理学将文学纳入道德体系的企图。他激烈批判理学化的诗歌倾向，提出“诗有词理意兴”，并以盛唐诗为例：“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别材”的内涵存在争议，一说侧重于创作主体即诗人的能力，一说指使诗歌成为诗歌的真正“材料”，两者意思相近。“别趣”内涵相对明确，在《诗辨》中也叫“兴趣”，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与理学的“义理”截然对立。“别材”“别趣”意义相似，有人据文义认为“别材”与“别趣”可以理解为互文或互义，二者当是同义复指⁸。

在认知论层面，“别材别趣”直接挑战了朱熹“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基础，试图恢复诗歌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地位。严羽通过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使诗歌摆脱理学工具化的命运，回归艺术本体。此外，严羽强调“兴趣”的审美独立性，明确指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将诗歌从理学的认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知识权力的争夺上，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创作方法实质上是科举应试技巧的文学延伸，文学在理学影响下出现政治工具化倾向。对此严羽在《诗辨》中尖锐批评“近代诸公”的创作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不仅针对诗学方法，更是对文学沦为政治附庸的抵抗。

别材别趣与格物致知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虽然严羽认为别材别趣无关乎书和理，但他实质上并不反对多读书、多穷理，而是指出应当如何读书与如何用书、如何穷理与如何说理的问题⁹。

六、历史影响

明代前后七子深受严羽影响，进一步发展复古理论，强调文学发展是不断演变的过程，各时代有独特风格，同时应继承前代优秀传统。基于此，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在文学创作与理论领域掀起复古思潮；模仿盛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追求雄浑壮阔的意境和豪放洒脱的情感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盛唐诗歌的风貌，对纠正明代初期文学创作的萎靡之风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明代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严羽的诗学理论对清代诗学也产生了重要启示。明末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类似于严羽的“兴趣”说，强调诗歌要具有含蓄蕴藉、空灵淡远的意境，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提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¹⁰，对严羽的诗学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境界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严羽的“妙悟”等思想，强调诗歌创作要通过直觉和感悟来营

7 《诗集传》，第2页

8 王骏飞：《回归“诗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现代阐释》，《当代文坛》2005年第4期。

9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14页

10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造独特的境界。

七、结论

严羽的“妙悟”“别材别趣”通过否定理学认知路径、重建创作主体性、回归诗歌审美本体，实现了对南宋理学诗学观的解构。与朱熹“以理统诗”的路径相比，严羽的“以悟破理”不仅是对江西诗派和理学诗学的反拨，更是在南宋文化认同危机下的一种诗学抵抗——通过恢复诗歌的独立价值，对抗理学对文学的霸权挑战。严羽通过文学复古强化文化认同，为当代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历史经验；“盛唐气象”的文化符号意义也启示我们如何在全球化中保持文化独特性。而严羽的理论困境在于，他将“盛唐”本质化为完美典范，反而限制了诗学的批判维度。明代前后七子机械模仿盛唐的失败恰恰印证了抵抗性理论被体制化后的悖论。然其启示依然珍贵：在《诗辨》结尾对“叫噪怒张”诗风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了对文化抵抗策略的深刻反思——真正的抵抗需要避免沦为简单的姿态对抗。

参考文献

- [1] 郭绍虞, 王文生. 中国历代文论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2]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3] (宋)朱熹注.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 班尼迪克·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5] 王骏飞. 回归“诗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现代阐释[J]. 当代文坛, 2005(4).
- [6] 朱志荣.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歌主体论[J]. 人文杂志, 2014(12).

Poetic Resistance in Yan Yu's *Poetry Discourse: The Poetry Critique* Under the Cultural Crisi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uan Jiato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s period of partial rule, it faced a severe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Yan Yu, in *The Critique of Poetry* from *The Poetic Discourse*, constructed a cultural resistance strategy laden with political metaphors through his advocacy for reviving ancient styles and poetic innovation. This paper, through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historical contextual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core concept of "reviving the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delving into poetic propositions such as "alternative talents and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ful comprehension." It reveals Yan Yu's intent to dismantle Neo-Confucian discourse, reconstruct cultural orthodoxy, and reinforce the subjectivity of Han Chinese culture. Yan Yu's poetic theory is not merely an aesthetic innovation but also a cultural-political practice conducted through literature, offering crucial insigh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safeguard cultural subjectivity amid crises. Under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his "Tang Dynasty grandeur" inspires us to uphold cultural uniqueness through aesthetic autonomy.

Keywords: Yan Yu; *The Literary Mind: The Art of Poetry*; Southern Song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the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Atmosphere; Insight; Unique Talent and Unique Interest